

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 崔波

2005年6月,《现代生活报》对《黄河文学》签约作家进行报道,首次提出了宁夏文坛“新银军”的概念。2008年3月,在《黄河文学》创刊100期之际,中国文学艺术界影响最大、最权威的官方网站——中国作家网推出了《黄河文学》专题,并正式提出了“文学银军”概念。这是对近年来银川文学事业发展的高度概括和肯定,也标志着银川文学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能称为“军”的,首先应该是一个团队,其次要有战斗力,第三是形成了一定的声势。“文学银军”正是一支在全国文坛具有冲击力的地方作家队伍,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近年来,银川文学事业蓬勃发展,一批中青年作家迅速成长,作品频见于各大文学期刊,显现了不凡的创作能力,在全国影响力不断增强,且以整齐的阵容活跃于中国文坛。郭文斌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荣获鲁迅文学奖是其中的一个典范。在“文学银军”的冲锋下,银川文学走向了全国;通过“文学银军”及其作品,越来

越多的人知道了银川，认识了银川，乃至喜欢上了银川。

为“文学银军”的形成和崛起，银川市文联及其刊物《黄河文学》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培养本土作家、青年作家方面，他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黄河文学》的期刊签约活动就非常成功，开了全国期刊签约的先河。当然，“文学银军”不是突然间形成的，有其历史渊源。长久以来，在银川这片土地上，一批又一批立志于文学事业的人，在不停地艰难跋涉，在孜孜不倦地创作，其中不乏张贤亮这样一些有成就的大家、高耀山这样一些文学拓荒者和郭文斌这样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正是有了他们打下的坚实基础、留下的优良传统以及所提供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才使银川文学一步步走向繁荣。

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能以团队的形式出现，肯定是和这个地方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的。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从水洞沟旧石器文化到现代工业文明，银川这块土地孕育和积淀了多彩的人文风情；作为一个开放的迅速发展的移民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又构成了银川多彩的现实生活。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元素、广阔的想象和表达空间，为“文学银军”提供了扎根的土壤和成长的养分，也锻造出了富有个性的银川文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反映了所在时代的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最深切的心灵呼唤。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领导亿万人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创造出了震撼世界的奇迹；银川和银川人民也正在进行着建设西北地区最适宜居住、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宏伟实践。这个时代为

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也赋予了文学创作者们反映时代最强音、表现时代主旋律的历史责任。我欣喜地看到，银川作家在大部分创作里，对现实的关注保持着相当的热情，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显示了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把握，写出了人民群众心灵的渴望。这正是“文学银军”能够形成并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文学银军”丛书的结集出版，无疑为五十大庆献出了一份厚礼。入选丛书的作家都是“文学银军”的主力，其作品基本代表了银川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整体实力。相信这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丛书的出版，可以进一步扩大银川文学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开创银川文学创作的新气象；也希望“文学银军”们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银川文学的历史使命！

2008年7月16日

诗意叙事及其意义

李建军

五年前，在2003年第8期的《上海文学》上，我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第三代西部小说家》的文章。针对年轻的第三代小说家的问题，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用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第三代西部小说家的写作还存在许多需要超越的局限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从整体上看，他们的作品虽然不乏新意和诗意，不乏朴实的情感和健康的道德内容，但是，缺乏境界阔大、思想成熟、技术圆练的大作品。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他们写到一定程度，一旦被社会认可，就不自觉地在已经形成的模式里进行复制性的写作，写出来的作品给人一种彼此雷同、似曾相识的印象。这几乎是所有那些已经成名的青年作家身上共有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我这样表达了对第三代小说家的理解和肯定：“是的，第三代西部小说家还走在路上，还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他们之所以值得关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成就可以被当作普遍有效的经验模式，而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是一种有价值的启示，给我们认识自己时代的文学提供了一种参照。他们的写作是一种面对大地的写作，是一种向他人开放的写作。他们自觉地抵抗来自第二代作家的消极写作的影响，从不靠大胆的粗俗和对人性、道德的肆意凌辱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他们身上，也很少看到都市的‘先锋’写作卖弄技巧的花哨和个人化写作渲染欲望体验的俗气，因

此，不管他们的写作存在多少问题，他们是担得起人们的赞许和期待的。”

坦率地说，在写《论第三代西部小说家》的时候，郭文斌还没有进入我的批评视野。那时，他的小说创作还处于一种艰难探索的“自在状态”，还停留在对中国的并不成熟的“先锋文学”的模仿阶段，还没有实现化蛹为蝶的转化和飞跃。

在郭文斌过去的小说中，我们时或可以看见他的缺乏内在深度的调侃，可以看见缺乏价值重心和可靠方向的形式主义倾向——这是我们在中国的幼稚的“先锋文学”中常常可以看见的文学景观。阅读中国“先锋主义”作品，我们也许会吃惊于他们想象的诡异和行文的恣纵，但是，更多感受到的，是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是面对文学的玩世不恭，是对人物的冷漠和无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温柔地怜悯，不再优雅地感伤，不再对诗意化的写作表现出虔诚的态度。我们的眼睛不是向内关注灵魂的拯救，而是向外渲染感官的刺激；不是向上追寻精神的光芒，而是向下寻求庸俗的满足。我们背叛了《红楼梦》的诗情化的叙事传统，继承了《金瓶梅》和《肉蒲团》的色情化叙事的衣钵。在我们时代的某些试图变革文学秩序的激进分子看来，文学本质上乃是一种消极的精神现象，它所关注的焦点，就是“私人”和“肉体”，因此，谁越是用粗俗、大胆的方式表现“欲望”，渲染“黑暗”，谁的创作就越是具有“先锋性”，就越是接近不受道德羁绊的“纯文学”。

然而，在我看来，当代文学之所以缺乏力量感和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缺乏诗意，缺乏对于善的朴实而坚定的态度。要知道，在任何时候，作为破坏性的力量，冷漠和冷酷都是瓦解人类内心生活的；在任何时候，作为诗意的对立面，庸俗和粗俗都是降低文学的价值和尊严的。

好在，郭文斌意识到了反诗化写作的问题和危险，他走出了“先锋文学”的歧途，踏出了属于自己的路子，或者用一位大师的话来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他成功地摆脱了过去的那种阴暗、畸形的写作模式的影响，选择了诗意化和善意化的写作路径。以美载善，以美启真，这就是郭文斌为自己确立的新的写作原则和文学纲领。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篇影响巨大的评论文章中说，托尔斯泰的小说之所以充满“优美迷人的特殊魅力”，是因为他在写作的时候，“始终保持着少年的十足的天真和纯洁”：“心理生活隐秘变化的深刻知识和天真未凿的道德情感的纯洁性——这是现在赋予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以特殊面貌的两个特点，它们（永远）将是 he 才华的基本特征，不管他的才华在今后发展中表现出怎样的新的方面。”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揭示的，乃是所有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共同的品质和特征。

道德情感的纯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诗意性，显然也是郭文斌后期创作的自觉追求。他把眼光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因为他们最能体现人性的美好和心灵的纯洁。孩子，这快乐的精灵，这给生活带来快乐和希望的天使，乃是郭文斌后期小说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文学形象。他无疑相信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孩子的纯真可爱和纯洁无瑕，可以成为照亮这个时代的精神之光，可以成为凜雪人心的净化力量。郭文斌笔下的农村孩子，虽然生活在困窘的家庭，常有冻馁之虞，但是，苦难、贫穷、饥饿从来不曾改变他们内心的纯洁和善念，恰恰相反，他们的心灵常常因为苦难而显得更加美好。他们的纯洁有助于人们培养一种大地一般稳定的心情态度，那就是对生活的平静而热烈的爱，那就是对未来的乐观而自信的态度。

当中产阶级化写作模式业已成为主宰模式的时候，当许多“著名作家”的写作沦为“社会订货”的奴隶的时候，当商业化和娱乐

化成为普遍的文学时尚的时候，郭文斌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研究郭文斌的诗意化叙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意义；应该研究为了实现创作的突破他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应该通过他的创作经验的研究，来考察伦理境界与文学诗意的关系；应该研究在以后的创作中，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必须应对的考验。

关于文学，几乎每一个命题，都可以找到几乎完全对立的理解，几乎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判断。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文学观上的分歧甚至对立，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在文学认知上，永远不可能找到一种普遍有效的“共识”和“真理”。然而，寻求一种普遍有效的“共同标准”乃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一个任务，就是通过对伟大的经典作品的阐释，来确立这一标准。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的序文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可见，从人类精神生活的共同性来看，确立这样的标准，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我看来，研究郭文斌的创作的经验和需要警惕的问题，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那些重要的“常识”和基本的“标准”。

在我看来，研究郭文斌的创作，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写作的艰难和快乐，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些重要的“常识”和基本的“标准”。许多批评家之所以对郭文斌的创作产生兴趣，其原因盖在于此；我们之所以编选这部批评文集，其缘故亦在于此。

谨序。

2008年6月7日，北京

人性本真的诗意描写和审美观照

——郭文斌短篇小说新作《吉祥如意》探析

◎ 徐安辉

叙写乡村生活，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但无论是古代乡村题材的作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乡土小说”，还是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周立波等为代表的“民族化、大众化”的乡村叙事，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农村生活表现，总免不了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思想感情观照乡村。更由于传统文化精神潜在的影响，或者由于对农村生活，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缺乏彻骨的感同身受，乡村原原本本的、具有泥土般的质感的存在，“农民本然的个人的生存状态与感受”，“乡村社会芸芸众生那各异而活生生的生命世界被貌似深邃的历史理性所遮蔽”^①。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对现实生活的还原与超越是建立在其切身体验及深切感受的基础之上的，作为“西海固”贫瘠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郭文斌，虽然跨越了传统乡村到现代都市的地理空间，经历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拥有了“智识阶级”的身份，但其在心性和感情倾向上，对乡村的古朴、本真和宁静却始终怀着温馨的爱，对乡村社会自在而又真纯，绝少世俗熏染的生命状态及在艰苦生存环境中，乡民心态的乐观旷达和精神狂欢，有着高度的敏感和创作热情。他的乡村题材小说，以诗意的感动情怀，把汉语普通话和纯熟而贴

^① 李洁非：《还原的乡村叙事》，《小说评论》2002年第1期。



切的乡土语言有机地结合，质朴、精炼、新奇，达意细腻而具内蕴，并选择纯真天然的儿童视角，在对乡村日常生活琐事的还原描述中，呈现被遮蔽的乡村社会本真及许多有生命力、启示力的东西，为我们创造了超越小说故事情境，审视大西北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独特审美空间。郭文斌乡村题材小说的这种写作风格在当下文坛无疑是独树一帜的。

2005年5月，郭文斌将其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精选为《大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乡村题材小说“以清新细腻、空灵飘逸而又略带感伤的笔调叙写记忆中的多情乡土，写成长中的童年趣事，写‘老家’那片土地上清纯、朦胧而又多错位的爱情”^①，如《大年》展开的是西部乡村过年写春联、上坟、吃长面、泼散、分年、糊灯笼、贴窗花等民间文化习俗的琐细描写，许多看似几乎无事且富戏谑性的细节，无不揭示出明明和亮亮一家人的物质生活景况和精神世界。生活虽然艰难贫苦，但他们却有着坦然、宁静的内心，有着善良、崇高的价值选择，夫妻、母子、父子间所体现出的亲情和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对作为人的本质的理解和尊重，呈现出乡村伦理世界的古朴、庄严和神圣，并滋润着乡村孩子单纯质朴的心灵；《三年》以西海固地区古老的民俗“烧三年纸”为题材，主要人物是两个儿童，并通过他们（明明和阳阳）的所见所思所想，把对死者的祭奠活动和对生者的生存状态及精神状态的揭示，有机而巧妙地交融起来，在儿童的意识世界里展现出乡村生活的纯粹，揭开了西海固人面对严酷惨烈的生存环境，遭遇艰难困苦命运时的精神真相。事实上，西海固人并非像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所说的是“在苦熬”，尽管困难仍然与生相伴，可是他们的内心同样有着面对生活的超然与平静，不自觉地寻求一种能超越不可为的现实，从而获得精

^① 李兴阳：《西部生命的多情歌者——郭文斌小说、诗歌艺术论》，《文艺报》2005年2月1日。

神上的绝对自由与自在解脱的生命支柱。艰难生命过程中对未来的幻想和希望，无疑是他们自由自在及精神狂欢的内在根源，这是西海固人生命力中的核。儿童视角的选择及其心理的在场，不仅是叙述的策略，它更体现为人物的乐观、智慧和平等思想，且富有喜剧色彩。作者对阳阳看似“无知”的细节描写背后，凸现的却是他生命的自然健康和纯真，与文本中又与文本外的世俗社会的成人世界构成了鲜明对比，使其成为美好人性的象征。作者的理性在于既肯定了西海固人民面对艰辛苦难的精神狂欢，又看到了他们所承袭的落后文化观念和被世俗同化的庸俗和病态，于是借阳阳之口发出了“活着的人是生的，死了的人是熟的”的意味深长的慨叹，而在小说文本的深层结构中，寄予了作者希望人们返璞归真，尽可能保留儿童纯真、自在的天性，远离世俗与尘嚣，达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超脱生死，成为一个“熟”的人，胸襟开阔坦然乐观地面对一切。《我们心中的雪》是一首有关爱的凄婉的歌谣，作者把“文革”时代的政治话语和“我”与杏花童年纯洁的两情相悦交融在一起，以调侃的方式揭示特殊时代政治意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对纯洁心灵的扭曲和异化，对优美、健康与人性和谐相融的精神生活的压抑。“我”与杏花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真诚相爱而不能永远相守，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人类爱情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悲剧，而当这种真爱在人为外力的挤压下，灵与肉不能交融而成为无奈，美好的记忆和情感就成了永远的“心中的雪”，圣洁而略带冰凉。在郭文斌这些精致而意味悠长的乡村题材文本中，作者不以观念代替现实，形象适应观念，也不用一般道德关于善恶美丑的观念对乡村人事进行解构，只是忠实地依着对乡村生活细致的观察、体味和感怀，客观率真地叙事、写人，使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层面异样而新鲜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近作《吉祥如意》则再一次显示了郭文斌乡村叙事小说的独特审美风格和艺术魅力。



《吉祥如意》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2006年10期，后被《小说选刊》11期、《小说月报》12期、《新华文摘》2007年2期全文转载，在获得2006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贞丰杯”2003至2006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近日又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与作者以往的乡村题材叙写相比较，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仍然是儿童，并以他们尚未遭受现代世俗生活的围困和挤压，生命的天然、纯真和美好为观照生活的视角，但在如何把短篇小说写得韵味深长，既有一定的故事情节的可感性，又让自己的形而上的哲学思索，对人生的感悟、理解从故事的机理中自然地“生长”出来，作者是颇有用心地建造自己的“希腊小庙”。“真正的艺术是超越美学的，它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势力，是对人之存在的最终解答。”^①从表象上看，《吉祥如意》写的是乡村古老的传统民间风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民俗小说，但事实上作者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再现端午节这一天发生在乡村的吃酒香四溢的甜醅子、家门上插柳枝、花馍馍供神、戴花绳香包、上山采艾蒿等富有地域色彩的习俗，在深层结构中，作者以精巧别致的艺术构思，在有限的篇幅内包容了丰厚的内涵，既富有生活的情趣，又具有幽深的意蕴。小说在叙事策略与技巧上很是讲究，把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叙述含蓄且富有儿童趣味，没有编排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只是凭借自己的敏锐和细腻，选择“过端午节”这一小而富有诗意美感和艺术张力的切口，对极其普通的乡村节日活动流程作细致的描述，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活动的揭示，深入开掘其中的底蕴。应该说小说的主体是五月和六月姐弟俩，而重点则在六月心态的细腻呈示，并把民俗、民情、人性天然融会。六月是一个还未

^① 谢有顺：《今日的艺术与理想》，见《我们内心的冲突》，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被世俗观念同化的纯真孩子，他有着天真、幻想、灵性、自由的诗性思维，作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真切地触摸到了人的灵魂世界，传达自己对生命存在的思索和感悟。在六月看来，节日时整个村子笼罩在蒙蒙的雾里，大门上插了柳枝的巷子活了起来，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柳枝散发出的清香，更是让人陶醉，此时此刻所唤起的是“美”的体验及由环境美所引发的美的情感。吃供品花馍馍一段写得很细致，“先从中间的绿线上掰开，再从掰开的那半牙儿中间的红线上掰开，再从掰开的那半牙儿中间的黄线上掰开，给五月和六月每人一牙儿”，这是祈求吉祥如意的供品，凝结了乡村人心底的美好愿望——抵挡“歪门邪道”。六月希望天天吃供品的理想，折射出乡村人的朴素情感，他们质朴的心灵渴望一切美好长驻人间，与生命存在相随相伴。端午戴花绳和香包，在小说中的两个稚嫩孩子的意识中，他们接受了善良母亲的说法，把绑花绳和避蛇咬直接联系起来，尽管他们吃了供品，胳膊腕上有了如同“布下了百万雄兵”的花绳，可当谎称有蛇或真正遭遇蛇的时候，他们还是惧怕了，甚至六月被吓得尿了裤裆。六月凭直感开始怀疑娘的说法，而五月更愿意相信真正的毒蛇在人的心里。姐弟俩对香包的争夺，对其飘逸而出的香气的贪婪吸咽，相互戏称蛇“就像个你”“你就是一条美女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的心在哪里”“人怎么就这么喜欢香呢”的疑问，在深层结构中，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具有隐喻意义的抒写，它触动的是我们对人自身本质的思考。人是社会的动物，既有自然属性的一面，又有社会属性的一面，社会性是作为人的本质。问题在于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何坚守原朴和纯真，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以爱战胜恨，温馨战胜野蛮。“人的存在是有位格（personality）的存在，这个位格决定他是一个有理性、有道德的人，他的存在是有规范的存在。人的高尚、爱、正义感和美等，都是从这个位格而来的，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有位格（人格）



而动物没有。人一失去这个位格的保护，人性就必然向兽性发展”^①。人有热爱美、追求美的存在的天性，也有在欲望役使下引发的蛇蝎般的狠毒，这种存在于人性中的两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使生命存在呈现不同的样态，形成复杂多样的文化人格，尤其是在“到山顶上去”的时候，要不失却未被世俗生存环境异化的纯真善良之心，以美塑造人格，激活人性光辉，“让一种要比香包上的那种香味还要香一百倍的香味”，驱逐心中的毒蛇，让至善圣洁的人性之美普照人类的内心世界。

在经历了真正的蛇和香包奇香的较量，毒蛇远去之后，六月成了一次灵魂的洗涤净化，怀疑从单纯的心底退却，他坚信香气能够驱走毒蛇，美能够战胜邪恶，多行善事，永葆心灵世界的纯洁，毒蛇就永远无法近身。心底无私天地宽，此时的六月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大家”的美好，人人都是那么可爱，就连平日里憎恶的人也变得顺眼了，他要把与姐姐争抢过的包裹着美好和期望的香包送给白云。浓雾散去后的山村和朝阳下的大山所呈现的美景与把吉祥和如意送给他人的六月的美好心灵相交融，让人陶醉并感叹大自然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也使得六月自己“心里美得有些不知所措”。作者通过互文结构的艺术构思，赋予了晶莹的露珠以多重意蕴，它既是太阳的儿子，又是大地的女儿，集天地之精华，是至纯至真的美的最高境界，而称其为“蛋蛋”，表明了人对此的由衷热爱，再与母亲唤五月六月为“蛋蛋”相联系，互为阐释蕴意，从而建立起人是万物之灵长，其心灵世界也该是至纯至真的内在关联。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消逝或被大地娘娘收去，它的“死”意味着其生命的再度升华，“死”而复生后则纯之又纯，美之更美，但至美又是脆弱的，它经不起任何的玷污和摧残，“在这个世界上，美，实在是太短促

^① 谢有顺：《王彪：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见《话语的德性》，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太脆弱了”^①。纯洁的孩子是美的，但在其生命的旅程中，它又是极其短暂的一个阶段，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心灵一旦被世俗和污浊侵蚀之后，就再也难返厚朴重归真纯，这是生命自身的存在悲剧。作为经历了人生风风雨雨的作者，深切地体验到生命运动中可能出现的人性的堕落，他甚至有些心痛地怀念至纯至真的童男童女的美好，也呼唤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人的美好心灵，不被破坏毁灭，不被世俗浸染而异化，甚至走向人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对人之存在的终极关怀。

当艾包含了天之子的太阳蛋蛋和地之女的露水蛋蛋之后，这时候采到的艾才叫“吉祥如意”，“采艾就是采吉祥如意”，作者在这里显然赋予了艾以象征的意蕴，是其为疗治人类精神疾病而开出的良药。荣格曾说：“世界发展的趋势显示，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荒、地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于人类本身，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适当的办法来防止比自然灾害更危险的人类心灵疾病的蔓延。”^②在作者的人生体验中，坚守纯洁的童心和对美好的挚爱与追求，是清除心灵的废墟，阻止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有效途径。这正如他在散文《点灯时分》中由于对生命的感伤而发的慨叹：面对世事的喧哗和骚动，要“披拨红尘”“于纷繁中守持宁静”，回归到“生命的朴真”和“那盏泊在宁静中的大善大美的生命之灯”，回归到“那个最真实的‘在’”，只有这样，生命的存在才会和谐幸福、吉祥如意，人类的未来才会健康、吉祥如意。

“一个人的写作面貌，在许多时候，往往是被他的天性、世界观所决定的”，“朴素、简洁、深刻，永远是作家的高尚美德”^③。在走过了人生四十个春秋的生命征途后，郭文斌不仅有了中年人的沉

① 郭文斌：《点灯时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② 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③ 谢有顺：《朴素的写作》，见《我们内心的冲突》，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稳和内敛，更有了历经复杂多变人事的淡泊、豁达、宽厚和宁静，“心如平湖，神如止水，整个生命沉浸在一种无言的福中、喜悦中、感动中”^①，守着生命最深处的自己，以善良的天性和独特的价值选择“以心传心”，并将其文学的触须深入到乡村生活世界的内部，“让天真带着他的笔旅行”，“寻找并且挽留住原本属于我们却早已丢失的原初的生命的丰富和生动”^②，创造纯净、至美至真而又含蓄、隽永的审美境界，这对当代文坛而言，其意义无疑深刻而久远。

（《名作欣赏》2007年第9期）

徐安辉 宁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① 郭文斌：《点灯时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② 李晓虹：《寻找回家的路——为郭文斌散文说几句话》，《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

美、善、和谐及小说的诗

——评郭文斌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

◎ 牛学智

“正面肯定性力量”、“弱势者”、“介入现实结构”等等都是小说不错的理论。甚至放大了看，这批理论的轮番轰炸，不仅给小说争回了面子，而且小说仿佛的确有了微言大义的撼人之处。当然，面对现实，那种我们极力想扭转却又十分无能的现实，它的岿然自洽，或者它的漫不经心，再一次扼住了理论主体的咽喉。这批雄心勃勃的理论似乎仅仅是一次学术动作。这就促使人们不得不进行一次反省：“正面肯定性力量”的对立面在哪里？“弱势者”的诉求是否面临着错位？“介入现实结构”的重担是否仅仅要落到文学孱弱的肩上？无可否认，文学的力量确实需要虚构的张力来完成。但是，当美仅仅作为陪衬，当善变成一种轻佻，当和谐成为人们厌弃的东西，也就是当美不再是美本身，善不再成为人们信赖的品质，和谐不再成为人际关系的主体。与其说这是现实，毋宁说这是理论的殖民地。许多时候，文学的叙述者也许就是在如此贫血的土地上制造着一批批的现实。它们似曾相识，它们的神情惊人地一致，它们的故事如出一辙，它们的命运都是那么令人扼腕。一方面，这可能就是现实；另一方面，这可能并非现实。重要的是，说的多了，我们相信它就是现实。

不言而喻，小说要一直翻到事情的真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者说压根就不是“怎么写”的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省



事的解释是：生活。事实上有人一直在这么做：挂职、下乡、调查、寻访等等。结果显示，除了带来一些“记录”的真实，本质的真实基本差不多。这个时候，有理由说，文学可能面临着危险：言说的无效。早有人证明，文学不比一条晚报消息高明多少。但是，文学似乎仍然显示着繁荣的迹象，一个准文学读者，就是不吃饭，也无法翻动成百上千份期刊。不要说真伪的辨别，就是敷衍一读也实属不易。这里不是探讨文学、读者、现实的关系，我指的是这种毛躁的心情同样不利于对美、善、和谐地发现。

读郭文斌的短篇《吉祥如意》（初发于《人民文学》2006年第10期，《小说选刊》第11期转载），实际上充满了这样的偶然性，纯粹是邂逅。如果没有余光慧先生的提醒，估计十有八九会擦肩而过。也夸张一点，不读《吉祥如意》，或许对2006年短篇小说的判断将存在很大的误差，至少，可能导致对一种重要的小说路向的疏忽。很显然，《吉祥如意》在同期《人民文学》和同期《小说选刊》中是个特别的存在。

五月和六月是童男童女，五月和六月又是姐弟俩。在端午节采艾的风俗中，五月和六月一定要领受节日的仪式、分享节日快乐、遭遇节日表达的民俗内容。于是，家家门上插柳枝的小巷，人人手腕上的花头绳、诱人的花馍馍、迷人的香料以及采艾时的神奇，都成了五月和六月不得不过的最快乐时刻。小巷顿时显得绵长而幽深，柳枝变得飘逸而柔美，平常的头绳也蕴含了无比强悍的驱邪力量，花馍馍不再是饿极而食的普通食物，香料芬芳的香气撩拨着人们对幸福的单纯期待，艾草牵动着一个庞大的意义世界。这个时候，五月和六月不妨暂时取消姐弟关系，他们神游于这个撩人心肺、充满诗意、布满想象的单纯世界。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开始意识到了美，他们开始涉足善，他们开始加入和谐的队伍中。于是，五月和六月成了两个能自觉感受美和表达美，能自行践行善和主动